

费彝民文库

论文卷

探索与追求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9年卷]

方延明 主编



范长江死因探析

储安平后期变化及其活动刍议

马克思主义新闻实践观的实事求是精神与实用主义的实用原则之比较研究

当代中国传媒的价值取向

从宣传到传播

合流的背后

论广告意识形态

媒介环境学家对“专门化(专家)”问题的警觉性认知

网络时代执政的机遇和挑战

从“对抗”到“协商”的政府网络舆论引导新模式

政党执政规律与大众传媒运行规律

主政者媒介素养刍议

对舆论引导主体引导能力的多维观照

社会结构视野下的政府新闻“知沟”效应研究

传播学基础研究和学科生命力

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领域作者、机构和地区的学术影响分析

中华艺术视觉信息数据库建设构想

传播学科的兴起

新闻教育反思中的“传播学”话语

批评性报道的法律意识与司法环境

10年：中国媒体侵权诉讼的“公众人物”理念

权利-权力制衡理论范式的形成

论媒体报道权与受众知情权的互动

凶手的媒介呈现与叙事模式研究

七年之痒：电视民生新闻的转型之路

从灾害新闻看知情权在我国的发展

金融危机传播中的两难选择

文明营销：社会治理模式的范式转换

伦理博弈抑或道德感召

变迁中的电视受众心理及其社会属性分析

图像传播与文化转向

意识形态的图腾抑或失效

虚拟教堂：对传播的“仪式观”的另类解读

白领身份幻象与符号消费

语境变迁、符号转译与迷群体



南京大学出版社

费彝民文库

论文卷

探索与追求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9年卷]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索与追求: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2009 年卷 / 方延明主编.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305-06995-6

I. 探… - II. ①方… III. ①新闻学:传播学—文集 IV. ①G21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7271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费彝民文库·论文卷
书 名 探索与追求——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2009 年卷
主 编 方延明
责任编辑 李志红
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
开 本 787×1 092 1/16 印张 21.75 字数 463 千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6995-6
定 价 39.8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言

一个学科的发展创新,靠一代代学人的探索与追求。

一个学院的建设与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靠老师的科学研究与教学以及社会服务。对新闻学这个学科来讲更是如此。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已经有 50 余年的办学经历,她始建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复建于改革开放之初的 20 世纪 80 年代,兴于新世纪。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已经建成一个具有三个本科专业、两个硕士点、多个富有特色的研究方向、教学科研在全国名列前茅的新闻传播学院。

近年来,新闻传播学院的老师们潜心钻研,学有所成,发表的论文每年以近 3 成的速度递增,2009 年比 2008 年增加了 70%,且产生了较好的学术影响,有多篇论文发表后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社科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

为进一步弘扬新闻传播学的科学研究,经院学术委员会研究建议,并经党政联席会议决定,拟出版三个系列的费彝民学术文库,分专著卷、教材卷、论文卷。论文卷先行出版,由每位教师推荐两篇在上年度发表的比较满意的论文,结集于每年“5·20”校庆纪念日出版,作为对上一年全院教师学术成果的一种回顾与展示。

我一直认为,一个老师的教学生命是由他的学生延续的,而一个老师的学术生命则是靠其论文、论著去支撑,其学术智慧经由作品流淌。

费彝民学术文库论文卷,按编年出版,今后每年出一本,2009 年为第一卷。

出书要起名字,为此我费了很大工夫,征求了许多人的意见,众说纷纭,很难统一。最后我拟定了“探索与追求”五个字作为费彝民学术文库论文卷的书名。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我想,学术研究的生命在于探索,探索之路是一条曲折之路,许多前贤哲人为此皓首穷经。探索追求是一种职业境界,我非常乐意和我的同事一起去探索追求,在探索与追求中寻找乐趣。

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我院将组织出版专著卷和教材卷。

此次文库出版,得到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施敏、李志红、胡翼青三人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深深感谢。

史延明

目 录

新闻传播史论研究

- ◎范长江死因探析 陈玉申 / 003
- ◎储安平后期变化及其活动刍议 邓利平 / 010
-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实事求是精神与实用主义的
实用原则之比较研究 方延明 / 017
- ◎当代中国传媒的价值取向 方延明 / 027
- ◎从宣传到传播
——试论新时期宣传工作创新趋势 叶 皓 / 042
- ◎合流的背后
——传统学派形成的知识社会学探究 胡翼青 / 056
- ◎论广告意识形态 蒋旭峰 / 064
- ◎媒介环境学家对“专门化(专家)”问题的警觉性认知 秦 州 / 070

政府新闻学研究

- ◎网络时代执政的机遇和挑战 叶 皓 / 079
- ◎从“对抗”到“协商”的政府网络舆论引导新模式
——以“躲猫猫事件”为例 巢乃鹏 / 092
- ◎政党执政规律与大众传媒运行规律
——实际内涵、作用层面及相互关系探讨 丁柏铨 / 099
- ◎主政者媒介素养刍议 丁柏铨 / 110
- ◎对舆论引导主体引导能力的多维观照 丁和根 / 127
- ◎社会结构视野下的政府新闻“知沟”效应研究 郑丽勇等 / 134

新闻传播教育与学科发展

- ◎传播学基础研究和学科生命力 段京肃 / 143
- ◎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领域作者、机构和地区的学术影响分析
——基于 CSSCI(2005~2006)的分析 段京肃 / 150
- ◎中华文化视觉信息数据库建设构想
——视觉信息处理机制的建模及在视觉信息数据库建设中的应用 韩丛耀 / 174

◎传播学科的兴起

——一段重新阐释的历史 胡翼青 / 186

◎新闻教育反思中的“传播学”话语 夏文蓉 / 193

新闻与法研究

◎批评性报道的法律意识与司法环境

——编辑记者、法官认知状况调查 陈堂发 / 203

◎10 年:中国媒体侵权诉讼的“公众人物”理念 陈堂发 / 210

◎权利——权力制衡理论范式的形成

——媒体与司法关系研究(1993~2009)述评 胡茵茵 / 216

◎论媒体报道权与受众知情权的互动

——以媒体对黄光裕个案的报道为例 夏文蓉 / 222

◎凶手的媒介呈现与叙事模式研究

——以《南方周末》报道(2007~2008)为例 周海燕等 / 231

传播与社会研究

◎七年之痒:电视民生新闻的转型之路 王 雄 / 243

◎从灾害新闻看知情权在我国的发展

——基于《人民日报》地震报道的历时性分析 邓利平 / 251

◎金融危机传播中的两难选择

——以三家中国报纸为分析样本 胡茵茵 / 260

◎文明营销:社会治理模式的范式转换 蒋旭峰 / 266

◎伦理博弈抑或道德感召

——公共关系履行社会责任的路径探析 祁 林 / 276

◎变迁中的电视受众心理及其社会属性分析 郑 欣 / 283

文化研究

◎图像传播与文化转向 韩丛耀 / 293

◎意识形态的图腾抑或失效

——关于两部二战宣传电影传播效果的比较分析 祁 林 / 302

◎虚拟教堂:对传播的“仪式观”的另类解读 秦 州 / 310

◎白领身份幻象与符号消费

——透视时尚杂志的消费主义逻辑 王 蕾 / 318

◎语境变迁、符号转译与迷群体

——关于《潜伏》迷的文化分析 朱丽丽 / 328

新闻传播史论研究

范长江死因探析

【摘要】 范长江在“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与他当年报道红军长征有直接的关系。他因为获得了在国民党军的防区内旅行采访的机会,得以对红军长征作近距离观察,新闻信息的主要来源是国民党军队。当红军集结在毛儿盖的时候,范长江曾对红军的动向进行了推测。他曾与国民党军官探讨过红军突围的路线,因此在“文革”中受到审查而被逼自杀。检视范长江当年的采访活动,他与国民党军官谈论红军突围的方向,是新闻采访的一种方法和技巧,是新闻记者的一种职业行为。从范长江的报道态度来看,他没有从国民党“剿匪”立场上来报道红军长征,也没有站在红军一边,而是以相对独立的态度来观察和分析问题,这是那个时代职业记者所秉持的一种新闻理念。然而,当媒介环境发生巨变以后,过去的那种新闻理念和职业化的行为方式就不易被人理解了。从他死后最初被定性为“敌我矛盾”来看,范长江的自杀是一种抗争。

【关键词】 范长江 长征 文革 职业化

一、关于范长江死因的两种说法

今年是著名记者范长江诞辰 100 周年,距他离世也已经 39 年了,但他究竟是怎么死的,却仍然是一个谜。1978 年为范长江平反的时候,只是说他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并没有说明具体的情况。各种纪念和研究范长江的文章,也几乎都是同样模糊的表述。在笔者查阅到的相关资料中,惟有两个人谈到了范长江的死因,而且是两种不同的说法。

《人民日报》记者金凤认为,范长江是因信仰崩溃而自杀的。她在一篇怀念范长江的文章中说:

他是 1972 年在“五七”干校时,听到“解放”他的消息后,跳井自杀的。……很多人不解,为什么宣布“解放”了,长江同志还会自杀呢?我揣测,可能是长江同志的信仰崩溃了。他追求的光明世界原来还存在着许多黑暗,解放后他的个人经历并不顺利,这之中也有不少难言之隐。尤其是骇人听闻的“文革”那种法西斯暴

行,恐怕彻底摧毁了他的信仰。他是高级干部,自然了解不少内情,愈是了解愈会令人失望以至绝望的吧。〔1〕

金凤的这个说法只是她个人的推测,也是一个不可能被证实的推测。在“文革”那样的政治风暴中,假如范长江的信仰真的发生了问题,他也绝不会向别人流露的。另外,范长江死亡的时间也不是金凤所说的 1972 年,而是 1970 年 10 月。那时,“林彪事件”尚未发生,范长江是否真的已经得到了“解放”,也是有待查考的。

另一个说法,来自金韵琴写的《茅盾谈话录》。金韵琴是作家茅盾的内弟孔令境的夫人,她 1975 年在茅盾家住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记下了与茅盾的许多谈话。茅盾对她说范长江是自杀的,最初的结论是“敌我矛盾”:

当时,冲击范长江并定为“敌我矛盾”的理由,是正在劳动改造的某蒋军军官揭发了蒋军在红军长征时期堵截红军时,记者范长江曾告诉他红军可能自毛儿盖突围。当时蒋军军官认为毛儿盖地势险恶,突围困难,红军是不会走这条路的,因此并未派驻重兵。可是后来红军果真从毛儿盖突了围。“文革”中着重审查了范长江的这段历史。范在那样的情况下,有话无法申述,终于被逼跳井自杀。〔2〕

茅盾还说:范长江去世后,其妻沈谱怀疑他不是自杀,要求调查但无结果,她写信向毛泽东申诉,毛批示“范案重新调查,定案结论要家属同意后交中央批准”。几经反复,终于重新定案为“不正常的死”,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保留党籍。但是八宝山革命公墓不同意存放范长江的骨灰,因为凡是自杀的人不能进八宝山,除非中央批准。又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仍规定不举行追悼仪式,不登报,不发消息。〔3〕

范长江的骨灰在 1975 年 8 月 6 日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茅盾的上述谈话就是他到八宝山吊唁回来后对金韵琴说的。由于当时没有公开报道,去吊唁的人也不多,茅盾说的这些情况也就鲜为人知了。《茅盾谈话录》出版于 1993 年,但似乎没有进入新闻史研究者的视野,近年新出的包括范长江传记在内的一些研究成果,也不曾有人引述过茅盾的这个说法。

较之金凤的推测,茅盾的说法更具可信性,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探究的线索。从茅盾讲的情况来看,范长江的自杀与他报道红军长征有直接的关系。那么,重新检视范长江当年的那段采访活动,会有助于我们对其死因作出分析与判断。

二、范长江在国民党军中的采访

1935 年 6 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到四川采访,原准备先作环川旅行,然后再入西康。这时候,范长江得到了一个机会,可以随国民党军的一个参谋团进入战区。他于是放弃了原先的采访计划,踏上了由成都北上的旅途。

当时,从江西转移出来的中央红军,已经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西北部。蒋介石也来到成都,部署对红军的追堵。国民党军在四川、甘肃之间的“剿匪”战场,在岷山南北分作三段:南部是第1师胡宗南的防区,中段是新编第14师鲁大昌防区,再往西北是藏兵的防区。范长江的这次旅行,先后从国民党军的这三个防区里经过,所以能够了解到红军的行踪,对红军的行动作近距离的观察。范长江于7月14日离开成都,与参谋团一起北行,途中路过前不久曾被红四方面军一度攻占过的江油、中坝、平武等地,7月27日抵达胡宗南驻扎的松潘。此时,红军主力集结在松潘西南方的毛儿盖一带,除一部分与川军有接触外,没有发生更大的战事。范长江在松潘停留了两日,访过胡宗南之后,又继续北行。在新编第14师的防区,结识了鲁大昌部下的青年旅长蒋云台,蒋向他介绍了国民党军在甘南布置军事“围剿”的情况。进入藏兵防区后,范长江又访问了洮岷路保安司令杨积庆。杨积庆派员护送他,沿途有藏兵引导。经过历时50天的旅行,范长江于9月2日到达兰州,随即发出了报道红军长征的首篇通讯。〔4〕

接着,范长江又在甘陕之间作旅行采访,并继续关注红军的行踪。当时的形势是,红25军从陕南西进陇南,转而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中央红军主力从毛儿盖移师北上,跨过松潘草地,冲出腊子口,由陇南出陇东,于10月进至陕北。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统一指挥西北地区对红军的“围剿”。从9月到12月,范长江奔走于兰州、西安之间,到红军刚刚经过的平凉、庆阳、天水等地考察,并再度采访了从松潘移驻甘谷的胡宗南。

范长江根据自己的采访见闻,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系列通讯,对红军长征作了追踪报道。由于范长江并没有进入红军,他的新闻来源主要是国民党军队。他虽然会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搜集信息,但一些最重要的军事信息,只能从国民党军队中获悉。在这些通讯中,他对红军和国民党军双方的军事部署、最新动向和相互交战的情形,都有具体的报道,其中的许多信息是一般人不可能了解和掌握的。

当红军还集结在毛儿盖的时候,范长江曾对红军的动向进行了推测。由于冬令将至,毛儿盖地区就要成为冰雪世界,红军非向外突围不可。他分析红军的出路,将有三种可能:一是西去新疆,这条路线自然障碍太大,大部队不易通过;二是东出松潘,这条路线为胡宗南重兵所在,颇难突破;三是北入甘肃,“以甘肃西南境之夏河、临潭、岷县、西固为目标,进入洮河与大夏河流域,然后或转陇南以出陇东,会合徐海东,更北接通陕北刘志丹,进入宁夏及陇西甘凉肃一带。”范长江认为,红军“以趋洮、夏两流域的可能最大”。〔5〕

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后,在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上一直存在严重的分歧,至8月下旬,红军自毛儿盖分路移动,左路军西出阿坝,右路军则经草地进入甘南。某国民党军官在“文革”时揭发范长江,说范长江曾告诉他红军可能自毛儿盖突围。从当时的情况分析,范长江在与这个军官的接触中,很可能同他讨论过红军突围的方向。这是新闻采访的一种方法和技巧,因为只有在与对方深入交谈中,才可能获得更多的信息。正如一本采访教科书所说:“成功的访问,绝非一手执笔、一手执纸的记录,而是知

识与感情的交流。访问固要自对方口中得到东西,但亦要有东西告诉对方。这种欲取先予的方式,也许比无予只取的方法要更为有效。”^[6]范长江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之谈:“记者一定要善于交朋友。交朋友要讲求方式方法,要作大量的工作,要生活在他们中间,很熟,有感情,彼此有交流,互相给予方便,互相服务。不单是要朋友帮你的忙,你也可以给对方提供消息、情况,互通有无。”^[7]就范长江当年采访时的情形来说,不仅是范长江想探究红军的行动路线,“政府军亦对红军之动向煞费苦心研究”^[8]。范长江和国民党军官就这个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讨论,互相交流所知的情况,把自己的看法告诉对方,是十分自然和正常的。从这样的角度看,范长江对国民党军官的采访是新闻记者的一种职业行为。

判断一个记者的采访活动是不是职业性的,还需要解读他的新闻作品,对他的报道立场进行分析。与当时国民党报纸上的“剿匪”宣传有所不同,范长江在通讯中没有称红军为“共匪”、“赤匪”,而是直接称作“红军”。他不仅报道了红军冲出堵截而进至陕北的过程,而且展现了红军的骁勇善战。譬如,他写徐向前用兵之能:“隔江油十余里处东山上,即发现徐向前围江油时所筑之环山大堡垒。要路口层层障碍,随山路之曲折,于射击点上节节作成土垒。环山大堡垒,以竹竿及松柏等枝干,交叉编成篱垣。环山三十余里,无一处有空隙可入。同行有通晓军事之某君,睹此布置,亦叹徐向前用兵之能,而恍然于川军之非其敌手。”^[9]又如,他写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号召力之大:“民众心中只知有‘苏维埃’、‘瑞金’、‘莫斯科’、‘列宁’、‘斯大林’等,而不知有‘西安’、‘兰州’、‘北平’、‘南京’等名词。某县长曾在合水以东召集民众训话,数次申传,到者寥寥。而苏维埃召集开会,则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立刻齐集百里以内之民众。”^[10]从这些内容来看,范长江的报道与国民党的“剿匪”宣传是有区别的。但是,范长江的通讯中也有一些这样的文字:“藏兵冲至万音,见万音附近放有二三百具红军死尸,多为冻死病死者,此等死尸之臂腿正被其未死之‘同志’割煮以充饥!藏兵虽野,睹此亦惊悸不已。”^[11]“阿坝附近死了一万以上的十五岁左右的小孩,都是朱德带去时冷死饿死走死的。红军注重少年作战,故小孩特多,在那样特殊气候下,当然小孩死得特别容易。其余班佑、阿西茸、白龙江上游、求吉寺、包座、毛儿盖、芦花、懋功、理番、大小金川一带,莫不尸横遍野,死亡载道!”^[12]“四川北部的农民叫红军做‘霉老二’,就是‘倒霉的东西’的意思。他们不管你红军政治部的宣传如何说法,你首先吃了他们的粮食,叫他们无法生存。在他们暂时看起来,真是碰上红军,就算大倒其霉了。”^[13]从这些报道内容来看,范长江也不是站在红军的立场上来报道长征的,他只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有些情况不一定真确)一一展示给读者罢了。他后来也曾明确地说过:“我还不能用共产党宣传员那样的立场来写文章,因为我自己还不完全了解共产党的主张,还不可能有这个立场。”^[14]

范长江没有从国民党“剿匪”立场上来报道红军长征,也没有站在红军一边,而是以相对独立的态度来观察和分析问题,这正是那个时代的职业记者所秉持的一种新闻理念。

三、生命的抗争

从上世纪 20 年代开始,中国的民营媒体逐渐走上了企业化发展的轨道,形成了职业化的新闻理念:新闻媒体的首要职责是向公众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新闻记者是事实的观察者、报道者,而不是某一集团的宣传员,或利益冲突的参与者。因此,记者在采访报道活动中,要保持超然的立场,“无论处于何种境遇,皆当确守第三者之高垒而勿失。惟以真理与事实为标准,不知有友,亦不知有敌。”^[15]记者以报道新闻为天职,为了获得新闻,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接触和交往,“上自最高当局国务要人、大政治家、大学问家、大资本家、奸人败类,以至卑官小吏、舆夫走卒,皆外交记者所可与接触之人物。外交记者心目中,绝无阶级之观念,惟以如何乃可尽其职务为交际活动之目的。”^[16]

范长江进入《大公报》的时候,他服膺的就是这种职业化的新闻理念。1936 年他采访报道“西安事变”,冒险闯入兰州,引起了许多人的怀疑,“有人看见我和若干中央军队熟悉,因而疑惑我有若何关系;又有人看见我知道一些共产党和红军的事实,以为我是某种程度的共产党。”因此,他在通讯中特别强调说:“我的政治关系只有一个,就是‘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我的职业是‘纯粹自由职业的新闻记者’。我们自由职业的人不反对人家有党派,但是自己不愿有党派,因为我们的立场,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向着这个目标努力的任何人,都是我们的朋友,违反这个目标的,都未便加以赞成。”^[17]正是基于自由职业者的立场,他与国民党军官们讨论“共产党和红军问题将来如何解决的方法”^[18],接着又进入陕北苏区,与毛泽东竟夜长谈。他在通讯中披露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真相以及中共所起的作用,毛泽东向他写信表示了感谢。

无论是与国民党军官的接触,还是对毛泽东的访问,范长江都是在履行一个新闻记者的基本职责:探寻事实,挖掘新闻。然而,当媒介环境发生巨变以后,过去的那种新闻理念和职业化的行为方式就不易被人理解了。他的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是中国现代新闻通讯的扛鼎之作,但 1949 年后却一直没有再版,他本人也在 1952 年调离了新闻界。据说,范长江在“文革”中被批斗,有一个原因是他曾是旧《大公报》的记者,而旧《大公报》在当时被人们视为很“反动”的报纸。范长江之子范东升说,“文革”时范长江的新闻作品被认为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因为他的通讯对毛泽东有这样的描写:“许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一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三家村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为长一点。”^[19]这段话其实是一种印象式的客观描写,只不过与后来宣传的领袖形象有所不同而已。可以想象的是,如果这样的文字也被认为有政治问题,范长江告诉国民党军官红军会从哪里突围,就是更严重的问题了。对于国民党军官的揭发,范长江百口莫辩,因为那种职业化的采访报道方式早已不复存在,人们已习惯于用政治思维来审视新闻记者的言行,尤其在“文革”政治错乱的氛围中,范长江的任何解释恐怕都不可能被认同。从他死后最初被定性为“敌我矛盾”来看,范长江的自杀是一种抗争。他同邓拓、

老舍、傅雷等人一样,用生命维护了自己的人格与尊严。

【注释】

[1] 金凤:《长江同志风范永存》,见《命运:金凤自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24 页。

[2] 金韵琴:《茅盾谈话录》,上海:上海书店,1993 年版,第 210~211 页。

[3] 金韵琴:《茅盾谈话录》,上海:上海书店,1993 年版,第 211 页。

[4] 过去有个几近定论的说法,认为范长江是第一个公开报道红军长征的人。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范长江发表关于红军长征的通讯之前,国统区的新闻媒体上已有许多关于红军转移和国民党军队进行追堵的消息。参见尹韵公:《为什么不是范长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 年第 2 期。还需要指出的是,范长江从成都到兰州的旅行采访,并非仅仅是为了报道红军长征,他对沿途各地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情况都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红军的行动是他在这段时间里采访报道的一个重点。

[5] 范长江:《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大公报》1936 年 9 月 14 日。按:国民党军方对红军的动向也有相近的判断。7 月中旬,蒋介石“委员长行营”的参谋团在《川甘边歼匪计划大纲》中判断红军的企图是“以一部袭取松潘,以大部经毛儿盖进窜岷县,一部经坝进窜夏河,期达越过洮、黄两河,接通国际路线,或由陇中窜向陕北、宁夏,与陕匪合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解放军出版社,1993 年版,第 551 页)范长江当时随国民党军的参谋团旅行,也有可能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获得相关的信息。

[6] 王洪钧:《新闻采访学》,正中书局,1955 年版,第 109 页。

[7] 范长江:《记者工作随想》,见《通讯与论文》,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 年版,第 317 页。

[8] 范长江:《松潘战争之前后》,《大公报》1936 年 1 月 4 日。

[9]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大公报馆,1936 年版,第 10 页。

[10] 范长江:《陕北甘东边境上》,《大公报》1935 年 11 月 25 日。

[11] 范长江:《徐海东果为肖克第二乎》,《大公报》1935 年 10 月 9 日。

[12] 范长江:《松潘战争之前后》,《大公报》1936 年 1 月 4 日。

[13]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大公报馆,1936 年版,第 66 页。

[14] 范长江:《我的自述》,见《范长江新闻文集》,新华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180 页。

[15] 邵飘萍:《新闻学总论》,京报馆,1924 年版,第 39 页

[16] 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京报馆,1923 年版,第 7 页。邵飘萍所说的“外交记者”,指的是采访记者,后来称作“外勤记者”。

[17] 范长江:《塞上行》,大公报馆,1937 年版,第 258 页。

[18] 范长江:《塞上行》,大公报馆,1937 年版,第 269 页。

[19] 范东升说：“抓父亲的理由是因为《中国的西北角》这本著作，说他有很严重的政治问题。文中描写毛泽东，说他‘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就是这一句话，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描写，应该说对毛泽东是一个正面的描写，但在文革中就成了大不敬。”（《责任：一个记者的天职》，《长江商报》2008年8月17日）按：范长江对毛泽东的这段描写见于《塞上行》而不是《中国的西北角》。

（原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3期，略有改动）

储安平后期变化及其活动刍议

【摘要】 储安平创办的《观察》周刊曾被誉为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旗帜性刊物。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思想发生变化,渴望融入新时代的潮流并努力为之实践,但最终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储安平的后期活动,折射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艰难历程,他真诚的精神令人深思与记取。

【关键词】 储安平 思想流变 真诚精神

储安平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的著名人物,亦是旧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受时代大潮的影响,他的思想观念与实践活动都发生了变化。终归储安平的改造不彻底,结果导致了毁灭。^[1]这里,主要就他新中国初期的新闻活动试作述评。

一、适应时代思潮的嬗变

储安平 1928 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后,就浸润在胡适、罗隆基、张东荪等知识分子在那里垒就的自由主义的绿洲里,这对他后来一生影响极大。1935 年到 1938 年,他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费边社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也在他心里打上了烙印。抗战结束后他相继于重庆和上海主办《客观》与《观察》周刊,坚持“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原则,实践自己的新闻理想,成为舆论界的风云人物。特别是办《观察》时他强调“思想的出发较之思想的归宿更为重要”,^[2]他不仅撰写大量政论评述国事、还约请各界名流撰稿热议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焦点问题,如批评当局的腐败无能,维护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批评美国的对华政策,同情支持学生运动等等,强调“重视自己的思想自由时,亦须同时尊重他人的思想自由。”^[3]他认为这些都是出自对国家的责任来促进民主监督,表现出对报刊社会功能的一种自觉追求。其中开展的“第三条道路”的讨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观察》成为当时的自由主义运动的一面大旗,有学者赞誉“它把中国广大的自由知识分子充分地调动和集结起来,更把近百年来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思想的水平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4]

新中国伊始,储安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判若两人。笔者以为,这主要有两方面的

因素。

一是来自客观环境。此前储安平在《观察》相继撰写《失败的统治》、《政治失常》、《一场烂污》等尖锐的评论,对国民党当局嬉笑怒骂,抨击其执政“二十年来中国人民受尽压迫、欺骗、剥削……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5]最终惹怒当局,借口《观察》“为匪宣传、扰乱民心”,在1948年12月底查封了杂志并通缉他,迫使他逃往解放区。这份洋溢着储安平至诚的理想追求、掷地有声的政论与独立精神的刊物遭到厄运,证明他追求改良式的道路行不通。而中共领导的革命结束了国家的内乱迎来了统一和平的局面,到处响起“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的嘹亮歌声。一时间各党派阶层都异常活跃,不少学术团体亦纷纷转变为党派性社团,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踊跃参加政治协商,举国上下欢天喜地。面对一个崭新的充满生气的新中国,谁都不能无动于衷,储安平也不例外。他感叹道:“毛主席及许多中共领袖先生的阔大深厚,人民解放军的严明坚强,中共同志的刻苦耐劳,使中国人民倾心折服、一致景从。”^[6]

另外来自主观意识。储安平往昔遭到国民党打压,而中共则对前政府所不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张以双臂欢迎,并给予他们以相当的礼遇,周恩来等领导人还专程拜望。储安平作为新闻界的代表参加了政协全国第一次会议,亲历了中共领袖们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以及各阶层人士的融洽氛围。共产党的作风民主、廉洁朴素、广受民众欢迎与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贪污腐败、千夫所指形成的鲜明对比,使得他感触良深。新时代翻天覆地生活撼动着储安平的情感、共产党的宽广胸怀感召着他的心灵,他欣喜地说:“解放以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都跨进了一个崭新的境界……中国有了一个有纪律的、有马恩列斯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中国共产党……使一切在怀疑中的、苦闷中的、彷徨中的知识分子终于找到了一条新的正确的道路。”^[7]一向信守无党派原则的他,竟一下子参加了民盟和九三学社两个民主党派,并颇为得意向他人炫耀这是“经不住两边的劝说”。

于是,储安平与众多国统区过来的知识分子一样,对新中国的主流文化思潮与价值规范,在心态上和思想上自觉进行调整,开始努力告别过去,构建新的价值系统的生活。

二、融入主流文化的实践

1949年11月,中央批准《观察》复刊,储安平仍为主编,但杂志的风格与先前完全不同了。

复刊开篇是储安平5000多字的《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他在回顾曾经不畏强暴地抨击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时,却这样反省:“由于我们在过去社会得到的教育,在思想本质上,我们还是停留在旧民主主义的范畴里。我们只批评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权的种种反动措施,但并未进一步去解剖揭发蒋介石反动政权那种反人民反革命的封建的法西斯的本质。虽然我们是一片赤心地爱着我们的祖国,热情地希望我们自己的国家变好,但是由于没有得到正确教育,我们在思想感情上就不可